

· 中西医结合之路 ·

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为发展 我国妇产科学作出新贡献(二)

于 载 畿

调整组织结构，保证科研工作 的发展和连续性

西医医学院有医疗、教学、科研三重任务，人员少、任务重，搞中西医结合工作并保持其连续性，是一个新的尝试。为保证宫外孕这一新课题的研究质量，只有进行妥善安排，重新调整组织结构，选配合适人员，并在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中随时加以变革，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概括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初期临床实践摸索阶段(1958~1961年12月)：有选择性地治疗病情已较稳定的宫外孕患者。在动员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下，固定了一位已毕业三年多，有一定临床教学经验和开拓精神的医生，专管宫外孕病种，遇有合适对象，则与李老师共同进行诊治，这样既不影响该医生的轮转与其他医疗、教学工作，又可学习老中医的经验，进行科学研究，此期共治愈51例患者。

初步总结提高阶段(1962年1月~1965年12月)：响应党中央号召，我脱产学习了中医，从临床实践中看到中医药对某些疾病确有显效，激发了我立志坚持搞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决心和信心，看到了老师们博学多能，受到很大启发，认识到不能只停留在单纯治疗陈旧性宫外孕阶段，还要开拓前进，扩大病种，于是组成了中西医结合专业组，其中又分宫外孕与杂病两个小组。与前阶段一样，固定了毕业已三、四年的医生分管患者，分别向两位中医老师学习，继承他们的实践经验，并以现代医学科学诊治手段进行总结，加以发扬提高。组内医生照旧值大班，便于熟悉产科和其他急症的诊治处理，遇有中医药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则改用西医方法或进行手术治疗。这样，既对患者有利，同时也不耽误西医技术的提高。至于教学工作，则与其他专业组医师一样，共同承担。在医生固定的前提下，护士长也相应固定，其后又增加了比较高年的医师，队伍更加壮大。组织形式改变了，全组医护人员齐心协力，不断实践、探索、总结、提高，仅仅四年时间，用非手术方法基本上无选择地治疗各

种类型宫外孕253例，并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一整套治疗规律和注意事项、护理常规、临床分型、固定处方和药物剂量、必须手术的指征等，都是在此阶段总结提出的。目前全国各地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多数就是以我们的诊治经验为基础的。

普及推广阶段(1966年1月~1969年10月)：1966年4月，中央卫生部组织专门小组，对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进行了鉴定，肯定了我们的成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给予我们莫大的鞭策与鼓舞。但是不到一个月，“文化革命”开始了，中西医结合专业组基本被解散。虽然科内同志轮流大转组，医护人员得不到固定，手术病例相对增多了，但是中西医专业组的同志们，多年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决心是比较牢固的，患者们要求不开刀治疗疾病的愿望是恳切的。所以只要原专业组的同志轮转到妇科，有诊治患者的机会，仍旧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即使1969年后期，医院搬迁到农村，我们仍不放弃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宫外孕的工作，形式上有些削弱，但是经过互相轮转，此种方法反而得以推广普及至全科，专业组成员也得到了熟悉其他专业组工作的机会。坚持就是胜利，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的工作，终于延续了下来，在此艰难困境中，采用非手术方法共治愈患者216例。

进一步提高临床及实验研究阶段(1971年6月~现在)：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以后，恢复了中西医结合专业组，原有医护人员又重新固定了下来，决心向理论进军。为了探讨宫外孕方药的作用机理，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难关，于1973年组建了有基础理论教师和临床医生、护士等人员参加的研究室，分药理、生化、病生、病理、化学、免疫等小组，并将研究室设立在附属医院，临床和基础教师均轮流短期脱产学习中医。这样大家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有了共同的语言。参加研究基础理论的同志，也定期到临床观察患者，了解病情变化，参观手术，认识宫外孕的发生发展规律；搞临床治疗的医护人员，也参加部分实验研究工作。这样互相学习，密切配合，仅用了一年时间，对活血化瘀治则，特别是治疗宫外孕方剂的作

用原理有了初步认识。事实证明坚持实践第一的科研方针，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的唯一途径。

在波浪冲击中前进

多年的实践经历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在中西医结合道路上，充满着矛盾和思想斗争。首先是个别同志对我国医学宝库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抱有怀疑态度，其次是个人主义思想，担心中西医结合治疗组搞不出什么名堂，别人讥笑，同时因缺少手术机会，西医水平难以提高，影响个人前途。特别当治疗工作中遇到挫折，碰到了困难，思想上就产生动摇。如有些患者病情经常出现反复，有的兼证长期治疗不愈时，也曾想到过开刀了事；抢救休克型患者和过去观察术后患者比较起来精神上要紧张多了，有时也会嫌累，怕麻烦而想打退堂鼓。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谈不到中西医结合的起步。为此，我们反复学习了党的中医政策，并以白求恩的伟大精神为榜样，扫除了思想障碍，增强了信心。

思想认识统一以后，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也很多。大家由于过去所受教育、经历和医学观点不同，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持有不同看法。为了能够步调一致地进行工作，我们决定首先学习和继承老中医的经验，经过大量实践找出规律后再向纵深发展。但中医宝库中和老中医所说的多半不是现代科学的语言，初学起来很困难，为了科学地总结我们治疗的病案，就先用老中医的习惯用语记录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工作，再逐渐把中医积累的经验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出来，这样则便于推广应用。治疗组的西医人员认真学习中医中药知识，虚心向老中医请教，老中医也尊重西医学的东西，不断吸取和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的长处，在具体治疗过程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医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由于思想认识一致，实践中步调统一，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工作即得以顺利地展开。在实践过程中，时间愈久，治愈的患者愈多，我们对中西医结合工作就越感兴趣，特别是1966年4月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通过了部级鉴定，肯定了我们的成果后，就更加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正当我们沿着中西医结合道路朝着更高阶段前进的时候，一场十年浩劫开始了。“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受到了批判，我们受到了百般刁难，讽刺打击，有人骂我们不务正业，中西医结合治疗组被拆散，我也被关入牛棚，丧失了人身自由，失去了继续工作的

权利。李老师保有一辈子的古医书被抢光。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整理总结经验的手稿被撕毁。中西医结合工作被时代推向了困境。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抉择，是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待机继续战斗，走振兴与繁荣中西医结合之路，还是任其衰落乃至消亡下去？等我恢复了自由以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前者。我们相信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疗法，是不会消声匿迹的，古代医学的发展是如此，现代医学也不例外。我们从困境中挣扎出来，首先就是抢救中西医结合原始病历资料 and 患者出入院登记本，我们把这些资料从老鼠窝和烂纸堆里找出来，想方设法加以保护。同时仍旧坚持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病，许多新的苗头都是在此时期直接参加临床实践而获得的，这些苗头为后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暴力和酷刑只是伤了我的皮肉，却未能摧毁我们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奋斗的决心，同志们更加团结，意志更加坚定了。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的工作未曾间断，所有的原始资料，特别是李老师的血汗和现代医学科学凝集出来的精华结晶，终于较完整地得以保留下来。这份宝贵遗产给我国医学宝库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给后代留下了书本上找不到的难能可贵的学习资料。

1970年末，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了，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被列为国家二十二项科研成果之一，中央直接指定我和李老师参加会议。李老师和其他三位名老中医出乎意料地同周总理一起端坐在主席台上，我和李老师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我们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又得以复生了。就在大家欣喜若狂、精神振奋、望眼欲穿地等待周总理接见、并举行表彰大会期间，李老师由于从悲伤忧虑突然转为惊喜，激动兴奋过度，加之会议间隙不分昼夜地为患者看病而过度疲劳，这位几年来受尽欺凌、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名老中医，还没有等到周总理的接见，在一次座谈会发言时突然发生脑血管意外，跌倒不省人事了，这真是一场悲剧，给了我非常沉重的打击。1971年2月6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周总理接见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肯定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绩，并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作为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这一项科研成果的代表登上了主席台，周总理和我亲切握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听取了我的简要汇报，并作了宝贵指示，他说，山西省妇幼卫生工作还有不足之处，叫我一定要好好为山西人民服务，还说服我的老师林巧稚教授用中医药治病。周总理的接见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精神力量，我决心今后要用中西医结合的

疗法更好地为山西以及全国的妇女服务，以报答周总理的关怀，这也是李老师与我的共同愿望。李老师生前常说，要用一生的精力与我们合作，将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用中医药一个病种一个病种治下去，成功了可以总结经验，传给后代，推广应用；失败了可以总结教训，告诫后代，不可重复。成功、失败对人类都是贡献，但重要的前提是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总结，才有实用价值，才有说服力。但不幸的是李老师的志愿尚未完全实现，却一病不起，无能为力了。李老师在困境中，一直梦寐以求地想等待恢复自由后，一定要到北京去，见见中央领导同志表一表我们搞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赤子之心。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不怕艰难险阻，搞中西医结合工作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没有错误，我们不是反革命，不是黑帮，请领导和同志们相信我们。当时李老师虽然身患重病，不能行动，不能直接和周总理对话，但是我们敬爱的知心人周总理，却一眼看透了我们的的心思，他非常了解我们。周总理毅然召开并亲自主持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挽救了出土不久、经不住风吹雨打、营养不足、水分缺乏的中西医结合事业这株幼苗。这次大会很特殊，周总理没有让代表们按照旧有的方式照稿宣读论文，而是将各项科研成果的代表，分别请上主席台，当众汇报成果，回答问题。周总理所提问题也不是一般性的，而是科学地反复深入调查所获得的具体真实情况，并有针对性地给以指示，不允许有任何掺假和“水份”。周总理的教导不是只对某一个人，而是对搞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所有同志，他的鼓励不是只对某一项成果，而是指向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整体。当然，其中也包括李老师和我们课题组的同志。我默默地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要把中西医结合工作一直搞下去，搞一辈子。

李老师病后，一直不会讲话，一年半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与世长辞了。我们悔恨，过去向李老师请教学习的太少了，许多宝贵经验还没有等教完和学会，他却带着大量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无声无息的离开了人间。悲痛悔恨都不能使已经丢失的时光复返，也不能使过去师生一齐合作的美景重现。紧迫感、责任感迫使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重整旗鼓，再接再厉，乘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东风，将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再次推向高潮。学习李老师的精神和毅力，坚持中西医结合方向，直到丝尽烛残。

1978年3月，我们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获得了重大贡献集体一等奖，相继又

获得其他会议的奖励。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是科学技术的春天，也是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春天。自中西医结合会议以后，我们遵照周总理的生前指示，举办了多次全国和地方学习班，已将非手术方法治疗宫外孕这一新疗法推广普及到全国各地，并将李老师的经验贮入电脑，而且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考察团的考察以及广交会、外宾参观学习等，将此疗法介绍到国外，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力量的源泉来源于各个方面

经过近三十年的临床实践，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任何成果的取得，都不是孤立的，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协助，才能胜利完成。

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了我们前进的航向，虽然前进的道路有曲折，最后还是返回正确的路线。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我们能够成立专业组，成功以后给予我们奖励和鼓舞，失败的时候帮助我们寻找原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困难时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等，这些都是和领导的支持分不开的。此外，良师的高尚道德情操，博学多闻、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解放思想、敢于创新，重科学事业、轻名利地位，谦虚谨慎、勤奋刻苦，以及团结协助的精神等，言传身教给予我们丰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食粮。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林巧稚和李翰卿二位老师，他们一位西医一位中医，专业不同但作风相似，教给我西、中医两套本领，为我顺利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奠定了基础。科内共同工作的医护同志对我的启发帮助也很大，即使在困难的时候，把他们打成黑帮，作出成绩后工资待遇比同年毕业的医护人员级别还低时，他们并没有怨言，还是不离开中西医结合组，坚持搞中西医结合工作；科内其他同志们也给予我的工作以很多帮助，广大患者的积极配合治疗，发挥医患、医护两个积极性，也是我们搞好中西医结合工作不可缺少的前提，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经我们治愈的宫外孕患者，从各方面保护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之间结成的真挚的友谊使我永生也难以忘记。上述的一切一切，都使我没有理由不抛弃一切个人名利，投身于这个神圣的事业，竭尽全力来培养决心要搞中西医结合事业的青年同志们。经别人培养出来的果子，吃起来很容易、也很香甜，但是培养新品种却比较困难，我不愿坐食别人的成果，我愿作一个培育新品种的园丁。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新成果，为发展我国妇产科学作出新贡献。